

# 評桑兵《國學與漢學——近代中外學 界交往錄》

周瑞坤\*

作者：桑兵

出版日期：1999年11月

出版地點：杭州

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

頁數：359頁（含緒論、徵引文獻、人名索引）

## 前言

每一代有每一代的學術風氣。清末民初因處於西方勢力的影響下，再加上中國在近代軍事政治外交上等挫敗因素，皆促使當時的學術界重新反省中國的傳統學術，這時期可以說是中國學術的轉型時期。當時學者最大的希望既在於能夠使中國重回漢學之寶座，既陳寅恪所說的「預」國際漢學之「流」。因此對於這一時期學術發展的研究，亦即學術史的研究，對於吾人在認識當時的學風發展脈絡和走向，

---

\*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碩士班研究生。



以及免去許多暗自摸索的功夫當有相當的助益<sup>1</sup>。

而學界對於清末民初的政治軍事、社會經濟等方面的研究，已有相當出色且深入的作品發表，且皆注意到西方對中國政治、社會、經濟等方面所造成的衝擊。但是對於當時中國學界和外國學界交往情形的研究，則似乎尚未引起學界的重視。而桑兵的《國學與漢學—近代中外學界交往錄》一書，則是就此探討中國近代的學者和外國學者往來的互動過程，進而體驗近代中國學術的發展過程。

## 內容簡介

本書除緒論外共分爲八章，作者主要在討論中國學者和歐美(以法國爲主)、東亞(以日本爲主)學者的交往過程。第一、二章主要介紹法國漢學界的發展，以及著名的漢學家和其對歐洲與中國學界的影響，對於中國的影響主要是使中國學者的研究趨向於「四裔偏向」，即以研究古代邊疆民族爲主的研究。第三章特別介紹陳季同的生平，作者認爲陳季同是中國溝通歐洲漢學的先驅。第四章介紹法國漢學家伯希和與中國學界的往來，及其對中國學界的影響。

第五章討論胡適和國際漢學的關係。作者論述胡適留學到歸國教書和對國內新文化運動的作用，以及其後來到歐洲、日本遊歷，認識許多漢學名家，對他的學術觀點轉變的影響。作者認爲胡適就像他自己評論梁啟超一樣，「才高而不得有系統的訓練，好學而不得良師益友，入世太早，成名太速，自任太多，故他的影響甚大而自身的成就甚微。」他本人後來也不免重蹈覆轍。(頁199-200)

---

<sup>1</sup> 陳平原〈學術史研究隨想〉收錄於氏著《游心與游目》(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頁35。

第六章論述中國和東亞各國的學術交流，以日本為主，旁及朝鮮、蒙古。作者認為在抗戰前中國學界對於日本學人的態度是「政治外交對抗，文化交流歡迎。」(頁244)第七章敘述日本留華學生，作者認為以往的研究都偏向中國留日學生，因此想從留華日生來看中日兩國的學術交往。而作者認為留華日生不但是中日關係的民間積極因素，對於日本的維新改革也有相當大的促進作用。第八章談論梁啟超和日本學界的交往過程，藉此探討梁啟超學術中的外來淵源，及其利弊得失。作者認為梁啟超和日本學界的交往是由合轉分的趨勢，而這主要是因為雙方在學術觀點和研究方法上的不同所造成的。

## 評介

本書雖然只用了一章介紹胡適和外國漢學者的關係，不過可能因為大陸曾經有過批胡的運動，因此作者對於胡適的學術和貢獻，多少就不像我們這邊那麼的推崇。例如作者認為胡適的小學功夫甚淺，他是憑藉聰明和無師自通的科學方法治清代學者成就最高的專門。(頁165)而胡適博士論文的遲遲無法通過，也並不是如唐德剛所認為的是因為當時哥大沒有看的懂他的論文的導師，而是胡適在口試時的表現確實不如人意。(頁151-135)其他的評論雖有些地方尚待商榷，不過至少提供了我們對胡適的學術及其在對中國學術貢獻的重新思考。

另外，作者在研究的過程中運用了相當多的史料，將中國近代學界和西方、日本各國的交往做了相當詳盡的敘述，體現出中國近代學術方向由歐洲重語言、文化的研究方法，轉而為類似考據的日本專精研究現象。對於研究近代學術轉變的學者而言，是一本相當不錯的參考書。特別是以前的研究主要是針對中國當代著名學者的求學經驗，和其受外國研究方法的影響來研究，例如談到胡適一定會和杜威的實

驗主義聯繫在一起。較少細論外國學者(特別是法、日兩國)個別和多位中國學者的交往過程以及雙方在學術上的切磋交流。作者將此事實點出,對於研究近代中國學術者而言,確有相當的貢獻。

不過在讀完全書後,筆者有幾點感想,首先是文章無連續性所以造成整本書缺乏系統性。由於書中的章節有些是作者以往在期刊上發表的文章,因此各章都可自成一體系,且多有重複之處。

再者,由作者對本書所取的書名可以看出作者的企圖心相當大,但是作者在人物的選取上,則頗讓讀者莫名其妙,例如為何在大家輩出的近代中國,選擇胡適、梁啟超以及陳季同,其有何代表性。對於這些問題,作者皆未加以說明。而且本書由於是多篇論文的集節,因此書中重複之處所在多有。對此,則讓讀者覺得作者是在「大題小作」。

而書中對於清末民初所形成的「四裔偏向」的研究傾向,作者認為這是因為西學東漸,中體動搖,使得近代學者鮮有不涉足西學所造成的。(頁23)這固然是表面上的原因,但我們也不能忽略這種學風形成的現實因素,既中國在當時因受外國侵略的影響,因而使得當時的學者想藉由研究古代邊疆民族和中國的互動關係,進而尋找出一條解決近代中國和外國互動關係的途徑。這是含有相當的實用性,且和當時的現實環境是相契合的,特別是其中是隱含有相當的民族主義意識在內的。<sup>2</sup>

此外,作者在緒論當中指出他認為研究學術史的方法在於二,一是「移植以往治思想史的主張,即將思想還原為歷史,使主觀變成客觀。」(頁16)其二是「文本與語境」。(頁17)就後者而言,作者是指在研究的過程中,要利用語境和文本來了解所評學案的真,與學者心路

<sup>2</sup> 見余英時〈學術思想史的創建及流變--從胡適與傅斯年說起〉載於《古今論衡》第3期(1999年12月)頁66-75。羅志田〈從歷史記憶看陳寅恪與乾嘉考據的關係〉載於《二十一世紀》總第59期(2000年6月),頁99-104。

的真，但是作者就此在書中的發揮似乎不多。其實運用語境和文本來研究，就是一種思想史的研究，而這也顯現出作者是有意識到學術和思想的研究是無法截然二分的。不過讀者在書中看到的多是一種學術交往過程的介紹，關於運用這種研究方法來說明或評論中西學者的部分，則寥寥無幾。因此，在書中讀者看到比較和思想史研究有關的人物是胡適和梁啟超，而這或許是因為這兩人的研究較為豐富的關係。因此對於其他的學者，作者則是介紹多於「語境和文本」的分析，例如第三章中的陳季同既是一例。因此可以說作者似乎未將其研究學術史的想法確實落實到書中。

而作者在書中對於當時中外學術交往對中國學術界所造成的影響未有深論亦是本書的一個缺憾。書中除了稍微提及胡適的整理國故以及北大國文科研究所國學門外，<sup>3</sup>對於當時學界交往所帶來的影響，如學科的分類，學術論文的寫作方式，專業期刊論文的出現，以及學術機構的創立，除了北大國學門外，當時亦有廈門大學國學院，以及後來中研院史語所的成立，皆可說是仿效西方而建立的學術機構。這些其實都可作為結語，不過本書因為是集結的文章，所以也就沒有闡出結論一章，這是蠻可惜的。

本書雖然缺乏連貫系，不過在書中所學的歐、日等國的漢學發展，多少有填補學界過去集中研究戰後漢學發展的空缺，<sup>4</sup>特別是以美國的

<sup>3</sup> 關於北大國學門的詳細研究，可參見陳以愛《中國現代學術研究機構的興起--以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為中心的探討(1922-1927)》(台北：政大歷史系，1999年)一書。而其中的第二章第四節既在談論此機構的成立，是和西方漢學的接觸影響有關聯性的。

<sup>4</sup> 如高明士《戰後日本的中國史研究》(台北：明文出版社，1986年增訂三版)。宋晞編《世界各國漢學研究論文集第二輯》(台北：中華大典編印會，1987年)。陶振譽《世界各國漢學研究論文集》(台北：國防研究院與中國文化研究所合作，1982年)。汪秋雁《海外漢學資源調查錄》(台北：漢學研究資料暨服務中心，1982年)。李璜《法國漢學論集》(台北：九思出版社，1975年)。

漢學爲主要的研究對象。因此本書的立論宗旨，既近代學術的發展，特別是和國際漢學界交流狀況的探索，皆有助於補充以往學界在討論近代學術發展時所忽略的部分，特別是只注意中國向西方的仿效，而未注意西方學界向東方的學習。

